

求真与研究

□ 韦地

科研的本性是求真。不过,能求到什么真?怎么求真却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。

譬如,要认识一所学校,我们通过了解学校的定位、培养目标、师资队伍、学生规模、专业开设等可以获得大致了解;我们或者通过学校发展的演变历程,在高校体系中的位置,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获得对学校的认知;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学校面临的问题、问题产生原因、解决思路、应对措施等获得对学校的把握。

以上三种认识都是求真,但三种求真获得的成效是不同的。第三种认识得到的“真”可能更深刻一些,透彻一些,因为一所学校其实就是在问题——解决——新的问题的螺旋上升中发展的。深入了解了学校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,其实就是对学校发展演变历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。这种求真相比“只知现在,不知过去;只知自己,不知别人;只知一点,不知整体;只知优点,不知劣势”的求真,无疑“真”的分量更足一些。

由此可以看出,求真的目的相同,但求真的途径、方式不同,获得的结果迥异。

“真”的获得还特别要关注以下几点:

一是要面向现实。历史上,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的经典,关键在于其能对本国的教育发展提出独特的见解。

现实中,我们常常能对国外的教育头头是道,经验启示列出一串(姑且不论是否求得了“真”),也能对教育的一般理论或原理大加指点,提出许多“应是”。可是,面对一所大学,一个专业怎么办?一班学生怎么教?往往缺乏有效的、能一语中的的对策,甚至“研究课程的人不知道学校开什么课程”。这些都是对中国现实缺乏了解和关注,对中国教育问题求的“真”还不够的表现。

“真”的获得更需要讲究方法。理论的创新依赖于方法的创新,更是以研究方法创新为前提。经济学中,利益和公平的“最后通牒”实验奠

定了实验经济学的根基。伦理学中,科尔伯格的海因茨偷药实验,为伦理学研究提供了经典案例。

中国学界对研究方法的重视起步于改革开放后,但至今仍然重视不够,教科书所列的一长串方法中,属国内创立的屈指可数。研究方法创新的缺失,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水平。

研究方法似是一座观景的大平台。不同的平台,独特的视野,总能给人不同的胜景。“思想方法上的忽略或欠缺,在很大程度上把学者研究的思想水平降低了”,提醒我们要创新研究方法、思考新的认识途径。

“真”的获得,还需要能有意识地拒假。除了拒绝捏造数据、抄袭的假外,求真还要能避免假问题、假逻辑、假推断。比如,避免以一句“很显然”“综上所述”“一言以蔽之”来代替严密的逻辑推理;避免用“必然”“肯定”等肯定语气,把一个个未经确证的判断,当作更高判断的前提。这些不足,有些确实是研究者受能力水平的所限,是无意识的。有些则是偷懒,不认真,不作为。该注意的没注意,该说清楚的,没说清楚,一心只为建设自己的研究“高速路”,大开研究的“高速车”。这种研究得出的“真”,真的不“真”,既愚弄了他人,也枉费了自己成长的好时机。

当然,求真更离不开锲而不舍,越挫越勇的精神。历史上,伟大的科学家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。因为“真”似乎从来都是藏隐的,需要人去发现的。比如,高深的真理是躲隐的,深刻的本质也总是隐在现象后面的。人类历经千万年后,才有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。教育的对象——人,在教育中占核心地位,但人们对自身的认识至今有限,大都局限于盲人摸象式的一鳞半爪。我国每年高产成千上万篇的硕士博士论文,以及学术专著,也没有把中国创新力推到世界前列。

大概正是这种对“真”的认识的无限性,需要研究者在求真道路上不断前行!